

# 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分层研究\*

齐明珠 王 亚

**【摘 要】**文章利用 2015 和 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内部结构性分化特征,从公共服务获得度、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 3 个维度构建社会经济分层框架,并结合 2019 年北京市调研数据,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特征、影响因素及演进趋势。研究表明:(1)在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体系中,公共服务获得度的影响最大,而以往研究中常用的职业声望差异较小。(2)中国流动人口按资本、专业、蓝领、弱势四组分层,呈现两端收缩、重心偏下的结构,中层及以上发育不足,需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其演进提升。(3)流动人口分层结构处于上移的趋势中。(4)城—城流动人口的分层结构更优,但未形成“橄榄”形,在“本地化”工作中需要“分层推进,分类指导”。(5)教育是造成分层差异的根本原因,提升教育水平是未来形成健康稳定分层结构的基础。文章提出完善社会培训体系、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优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 分层结构 社会经济分层指数 人力资本

**【作 者】**齐明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王 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人口流动性增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为 3.76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4,其中绝大部分为劳动年龄人口,在全国总劳动力中占比超过 1/3,流动人口已成为全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描述其分层结构、特征、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准确把握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助于完善流动人口发展战略与政策,更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特征与市民化路径研究”(编号:18BRK005)的阶段成果。

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2000年以来,流动人口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拉大,已成为社会经济状况各异的多元分化群体,对整体社会、人口结构乃至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相关政策多将流动人口视为一体,对其内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认识不足,在市民化、高质量城镇化等工作中缺乏分层推进、分类指导,在流动人口治理、超大城市人口疏解等工作中难免“一刀切”,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出现滞后乃至偏离。

其次,对流动人口分层结构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找准提升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的路径。中国经济转型要求实现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至关重要,这对未来人口尤其是劳动力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结构优化可以有效应对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挑战,适应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本提升的需求,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

第三,人口发展规律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层也有其特有的结构与适用的研究方法。国外相关研究总结了人口社会经济分层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然而,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在四十多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进行的,特有的“半市民化”国情也使流动人口分层特征与其他社会分层结构存在差异。本文将从中国实际社会变迁出发,研究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层依据、分层特征、分层原因及结构优化方向。

## 二、文献回顾

社会分层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其理论的发展往往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产生,并体现在分层维度的划分上。现代社会分层理论的三大源头是马克思的阶级划分、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和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分层,其根本差异在于分层标准。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新流派也大多是对社会分层标准的改变或重新阐释,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早期的分层是根据不同权力、地位或威望的各种社会等级对个人和群体进行分配与定位(Andersen, 2011)。20世纪后半叶,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发展差距拉大,社会分层理论开始逐渐关注社会经济差异等问题(Blau等, 1967; Parkin, 1971)。2000年之后,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受到更多关注(Marginson, 2016; Posselt等, 2017)。

与此同时,测量体系和方法不断丰富。Treiman(1977)根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生成了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Ganzeboom等(1992)提出的国际社会经济指数(ISEI)中职业分类更为详尽,包括7个主类、83个次类、260个职业单元及90个特定职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职业类型,在之后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调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也发生了重

大变化,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分化,分层标准倾向多元化(张文宏,2018)。代表性文献包括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李强,2005)、“土”字形结构(李强,2015)和“十大阶层”的社会分层框架(陆学艺,2002)等。李强认为,户籍制度是城乡分野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结构从倒“丁”字形向“土”字形转变,说明底层群体出现向上流动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呈底层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贺雪峰,2017),认为中国社会是类“纺锤”形结构,城乡二元体制是“保护型”的。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所有制结构的重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李培林,2011),公共权力维度进入社会分层,有研究以权力支配关系作为阶层分化的基础,形成“五大阶层”社会结构(刘欣,2007)和“权威阶层体系”(李路路等,2012;何晓斌、董寅茜,20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并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总体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李怀,2020)。新阶层成为社会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形成“多元的中产阶层”(秦广强、张美玲,2019)。同时,新阶层内部差异较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需要加强对新社会阶层发展趋势和内部群体差异的研究(李培林,2021)。与国外分层研究类似,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至今也多以职业为核心指标。

流动人口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社会群体,其规模在2000年后快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最先流入城市的是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分层研究大多围绕农民工展开。谢建社(2006)从职业及与土地关系将农民工分为五类;黄江泉(2011)根据职业投入差异将农民工分为三类;齐红倩、席旭文(2016)结合代际人力资本将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四类。近年来,开始有研究以流动人口总体作为分层对象。杜旻(2013)借鉴“十大阶层”框架,以职业为标准,将流动人口分为10个阶层。总体看,多数研究分层维度较为单一,导致层、类之间的对比维度不够丰富,不能综合反映流动人口内部每个群组的总体特征,也未能对分层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

此外,城一城流动人口社会分层还未引起政府和学界关注。目前城一城流动人口总规模已超过1.06亿,且群体内部差异增大。与乡一城流动人口一样,城一城流动人口也是户籍制度下“区域分割”的受损者(谭日辉、王涛,2019),在流入地同样遭遇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有“本地化”的需求。然而,在当前公共服务均等化、市民化等工作中,政策主体对象均为农业转移人口,鲜有关注城一城流动人口。

总体看,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1)分层标准较为单一且主观性强,多以职业为单一或主要分层标准,没有形成更加多元化、更具客观性的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指标体系。(2)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对流动人口分层结构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够深入,流动人口结构优化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及对新型城镇化的意义和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认知。(3)大部分研究对象为农民工,缺少城一城流动人口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针对上述局限,本文从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

流动人口自身分层特征出发,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多元社会分层指标体系,揭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层结构、特征与变动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成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流动人口总体社会经济结构上移、优化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结构、有效推进市民化及高质量城镇化等政策建议。

### 三、理论框架与数据方法

#### (一) 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理论框架假设

社会分层理论并非一成不变,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进,特别是分层维度应基于社会经济特征来建立。流动人口是一种资源禀赋,人口流动本质上是资源流动。中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权益没有完全与资源禀赋的流动相适配,存在一定的冲突或扭曲。流动人口所需要的配套支持受限,导致以公共服务为突出代表的权利在流入地受损,使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具有特殊性,因此,本文选取公共服务获得度作为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框架的第一个维度。

本文第二、第三维度借鉴韦伯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维度作为分层标准。经济维度上的差异以“收入”衡量,财产差异使社会成员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社会维度上的差异以“身份群体”衡量,身份群体是依社会评价与价值创造形成的声望分层,这两个维度能很好地反映中国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差异。由此,本文提出适用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三维度社会经济分层理论框架假设,并选取能够反映这3个维度的具体指标,通过实证加以验证。

#### (二) 数据来源与指标界定

本文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选取在业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得到有效样本130471个。为反映流动人口分层结构的变化趋势,本文采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对比,按同样的数据处理标准,得到有效样本174291个。另外,在实证部分结合2019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sup>①</sup>进一步分析。

基于上述流动人口分层框架假定,依据可获取、可度量的原则,在每个分层维度选择至少两个反映流动人口在该维度上核心社会经济特征的指标,且这些指标在流动人口中具有较大差异,以便于分组。各维度选取的指标及其界定如下。

##### 1. 公共服务获得度维度: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与医疗保险

单位性质与公共服务获得度密切相关,往往决定了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入学、本人的各种社会保障度等。本文将单位性质归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

<sup>①</sup> 该调查为笔者于2017~2019年在北京市朝阳区开展的流动人口跟踪调查项目,本文选取2019年1月的数据,共2559个样本。



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私营单位(包括集体企业、股份联营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与其他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社团民办组织、其他和无单位)三类,依次赋值为2、1和0。就业身份变量分为:雇主、有固定雇主的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等)、自营劳动者和其他五类。比较而言,前两类就业稳定性较高,享有的权益保障更高。据此,将前两类归为正式就业,后三类归为非正式就业,分别赋值为1和0。是否在流入地缴纳医疗保险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医疗保险分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四类,在流入地缴纳以上任何一种医疗保险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 经济地位维度: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

收入是经济地位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选用平均个人月收入和家庭月收入两个指标。由于最高收入过高和最低收入过低扩大了方差,易造成偏差,因此对负收入和个人月收入高于4.5万元、家庭月收入高于9万元的数据进行两端缩尾处理。

3. 社会声望维度: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职业是不可或缺的指标。本文参照 Ganzeboom 等(1992)的国际职业地位社会经济指标体系(ISEI),遵循不交叉、全覆盖原则,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十九类职业与 ISEI 的职业编码对应,得到从22分到67分的职业声望分值表。每类职业对应的声望得分及流动人口中各职业类型占比如表1所示。对职业占比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到流动人口职业声望平均得分为43.3分。

受教育程度既是分层来源,又是影响社会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为满足后续建模对变量的间距性要求,本文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将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分别赋值为0、6、9、12、15、16、19。加权平均后,得到流动

表1 流动人口各类职业声望得分及所占比重

职业分类	声望 得分	占比 (%)	职业分类	声望 得分	占比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67	0.5	快递	25	1.0
专业技术人员	67	11.1	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	48	13.7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9	1.8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5	0.9
经商	54	21.3	生产	36	19.8
商贩	35	1.7	运输	34	2.7
餐饮	33	6.6	建筑	32	3.6
家政	24	0.5	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9	4.7
保洁	22	1.9	无固定职业	22	1.6
保安	26	1.5	其他	26	2.2
装修	32	3.0	(加权平均)	43.3	100.0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3 年。

### （三）分层指数体系构建方法

社会分层指数既不表明流动人口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代表个体距离“满分”的差距,而是表示个体在分层中的相对位置。分层指数体系的建立有 3 个关键点:如何确定分层维度及各维度相对重要性,各维度的指标含义,以及如何克服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分层维度和权重由主成分分析结果确定,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本文中的 7 个指标可以转化为 7 个公因子,并按方差大小排序,舍弃重要性低,即方差特别小的公因子,同时方差大小代表各维度的权重。(2)每个维度的含义由载荷较大的指标决定,绝对值代表大小,正负代表方向。(3)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线性的降维算法,通过将  $N$  维特征进行正交变换,得到相互独立的  $k$  维 ( $k < N$ ) 数据,形成彼此相互独立的主成分,解决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

### （四）指数值的计算

分层指数体系确立后,各维度权重与该维度公因子值的乘积的加总为每个样本的社会分层值,即:  $Y_{ij} = \gamma_1 \hat{F}_{1j} + \gamma_2 \hat{F}_{2j} + \gamma_3 \hat{F}_{3j}$ 。其中,  $Y_{ij}$  为拟合的社会分层指数,下标  $i, j$  分别表示第  $i$  个公因子、第  $j$  位流动人口个体。 $\hat{F}_{1j}$ 、 $\hat{F}_{2j}$ 、 $\hat{F}_{3j}$  分别表示公共服务、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维度的公因子得分,  $\gamma_i$  代表每个公因子的权重。为了直观展现,将指数进行 0~100 的标准化处理,得到最终的社会分层指数。

## 四、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结构与特征

### （一）三维度分层指数体系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层结果

本文使用筛选后的 7 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并通过因子旋转使因子载荷更加集中,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KMO 值和巴特利球体检验都是主成分分析效度检验指标,本文结果中 KMO 值为 0.64,在可接受范围,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非常显著,  $p$  值远小于阈值 0.05,说明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2 显示,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与医疗保险在第一个公因子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反映公共服务的获得度和获

表 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指 标	公因子 1	公因子 2	公因子 3
	公共服务获得度	经济地位	社会声望
单位性质	0.862	-0.035	0.015
就业身份	0.838	0.053	-0.073
医疗保险	0.622	0.102	0.357
个人月收入	0.021	0.911	0.132
家庭月收入	0.058	0.912	0.108
职业声望	-0.142	0.086	0.867
受教育程度	0.373	0.188	0.692
Kaiser-Meyer-Olkin (KMO)			0.640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225762.743
Sig.			0.000

注:根据 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

得水平,命名为公共服务获得度维度;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在第二个公因子上载荷较高,命名为经济地位维度;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在第三个公因子上载荷较高,命名为社会声望维度。同时,方差贡献率代表相对重要性,作为各维度的权重依据。这3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34.0%、24.0%和15.0%,总方差解释率为73.0%。由此,验证了上述三维度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理论框架。

依此分层指数体系,分析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探究变动趋势,并对其进行有效分组,发现以下3个特点。

1. 中国流动人口呈两端收缩、重心偏下的总体结构

在分层维度及权重确定后,根据每个样本在各公因子上的载荷,可以计算出所有样本的社会经济指数值。之后,以各指数值上的样本数为权重,得到流动人口总体的社会经济分层指数结构。如图1所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结构重心位于中低部,中部以上快速收缩,最终形成一截细长的立柱延伸至顶部,最底部呈根状收缩。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结构的中下部,且中部及以上收缩过快,发育明显不足。

2. 中国流动人口呈现特征鲜明的4个层级

得到分层指数得分后,本文采用3个维度的公因子值进行聚类分析,分出4组和5组两个结果,进而通过每组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指数值的分布确定每组的分界值,形成最后的分组。基于社会分层指数值,本文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弱势组、蓝领组、专业组和资本组,其中蓝领组又进一步划分为劳工组和技工组。这些组在公共服务获得度、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3个维度上的特征如表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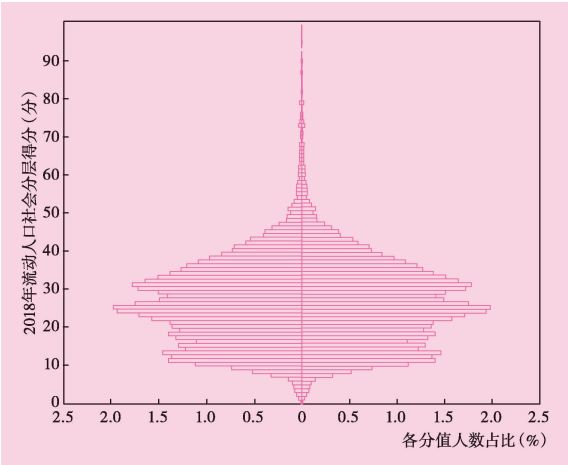


图1 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结构

注:纵轴左右相同,表示流动人口各得分的人数占比。例如,分值为42分,左右均为0.6%,表示42分的流动人口数占总流动人口的1.2%。

资本组处于最上层,仅占0.4%,处于分层结构的中上向塔尖延伸的细线部分。该组在公共服务获得维度上的表现略低于专业组,但明显高于其他组;经济地位维度上的优势非常突出,平均个人月收入为5.8万元,家庭月收入为8.4万元,约为专业组的4倍;社会声望维度与专业组基本持平,职业类型上雇主占比高(约为60%),对就业岗位增加有较大贡献。

专业组处于中间,分层区间为44~70,可视为进入城市的中产阶级,但占比仅为5.3%。专业组人力资源禀赋最

高,其中 81.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与其他组相比,专业组在公共服务获得维度与社会声望维度方面表现最优,97.4%为正式就业,91.2%在流入地有医疗保险,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也最高,为 32.7%;经济地位维度方面,个人月收入均值在 1.4 万元以上,远超 2018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的 6 868 元。总体看,资本组和专业组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声望均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居民。他们学历高,工作稳定,居留意愿高,可作为市民化优先推进的对象。

蓝领组人数最多,占流动人口的 77%,分层区间在 15~43,处于分层结构的中低部。这一群体内部进一步分化为劳工组与技工组,劳工组在各维度均弱于技工组,尤其是在受教育程度和公共服务获得方面。劳工组中仅有 7.1%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1.7%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在流入地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 24.4%,保障度相对较低;而技工组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40.8%,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占 15.4%,有医疗保险者占 87.6%。劳工组和技工组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劳工组在流动人口中占比超过一半,若职业技能有所提升,则可能向上流动到技工组,进而优化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度低,应对风险能力差,也有落入弱势组的风险;技工组在总流动人口中占比为 24.9%,若这一组在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源禀赋方面进一步提升,则可能进入专业组,从而有效扩大流动人口及流入地城市的中产阶层。

弱势组处于结构最底部,占流动人口的 17.3%,虽然比例不高,但不容忽视。这一组学历低、专业技能低、社会保障度低,是典型的“三低”人口。他们中大部分是从事传统服务业的自营劳动者,或是在服务业、农林牧渔与生产制造型企业就业的无固定雇主的雇员,在各维度均处于弱势,尤其是公共服务获得度方面,98.8%在“其他单位”就业,正式就业占比和在流入地医疗保险参保率极低;经济收入方面,约是劳工组的 3/4 左右;职业声望与劳工组接近,但受教育程度明显更低,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者不足 0.1%。弱势组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职业技能均处最底端,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向上流动的

表 3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组结构特征比较

指 标	弱势组	蓝领组		专业组	资本组
		劳工组	技工组		
各组分层指数区间	0~14	15~31	32~43	44~70	71~100
各分层人群占比(%)	17.3	52.1	24.9	5.3	0.4
公共服务获得度					
国有企事业单位(%)	0.0	1.7	15.4	32.7	8.2
正式就业(%)	2.2	75.7	97.6	97.4	94.6
医疗保险(%)	1.2	24.4	87.6	91.2	84.2
经济地位					
平均个人月收入(元)	3332	4668	6148	14298	58472
平均家庭月收入(元)	5827	7684	10116	24060	83635
社会声望					
职业声望加权均值(分)	42.1	40.9	46.2	56.2	54.0
大学专科及以上占比(%)	0.1	7.1	40.8	81.8	58.5



主要门槛也在于学历和专业技能。

总体看,根据本文建立的三维度流动人口社会经济指数分层体系,可以探知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总体社会经济分层结构特征,并依此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特征迥异的四组。这样的分组有助于在流动人口相关治理政策制定、市民化推进等工作中找准对象,突出重点,使工作更具针对性、更加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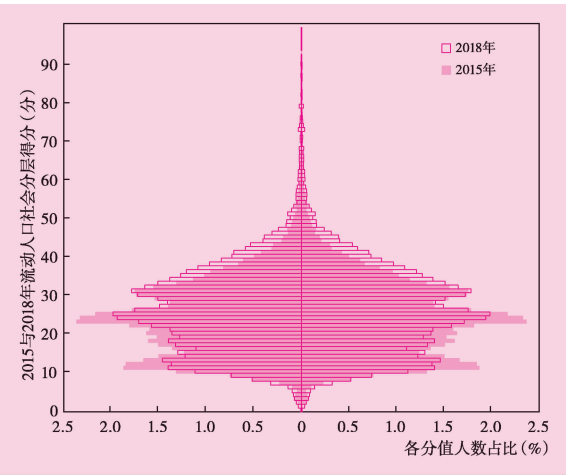


图2 2015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比较  
注:同图1。

从分组情况看,2015~2018年,弱势组占比从20.0%下降到17.3%,下降2.7个百分点;蓝领组总体占比基本未变,但内部结构明显优化,劳工组占比从57.5%下降到52.1%,下降5.4个百分点,技工组占比从19.2%上升到24.9%,提高5.7个百分点;专业组和资本组占比分别从3.1%和0.2%上升到5.3%和0.4%,均有明显上升。直接比较2015和2018年流动人口在7个指标值上的变化情况,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上升最快,3

(二) 中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有所上移

为进一步考察流动人口分层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对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在业流动人口进行了同一标准的分层,收入用2018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为方便对比,本文将2015和2018年的分层结果放在同一张图中展现(见图2)。直观看,2015~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总体有所上移,表现为中下部占比减少,根部收缩,中部及以上占比增加。

表4 2015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  
各指标变动情况

指 标	2015 年	2018 年
公共服务获得度		
国有企事业单位(%)	5.3	6.5
正式就业(%)	70.2	69.7
医疗保险(%)	31.7	39.9
经济地位		
平均个人月收入(元)	4850	5520
平均家庭月收入(元)	7864	9124
社会声望		
职业声望加权均值(分)	41.8	43.3
大学专科及以上占比(%)	13.5	18.4

年间从13.5%上升到18.4%;除正式就业外,其他5个指标也均有明显提升,可见,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状况呈上升趋势(见表4)。

与之前相关文献中的研究结论相比,可以进一步支持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总体社会经济地位上移的结论。顾东东等(2016)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提出中国农民工社会分层呈“金字塔”形,这个结论可以近似地作为对流动人口的分层。“金字塔”形的特点是底部人群最多,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人数最多的处于中

下部,而最底部呈根状,且出现进一步收缩趋势。这表明流动人口总体社会经济状况明显提升,处于最底部的人群占比减少。尽管如此,这种上移还远不充分,与“橄榄”形社会结构还有较大差距。

### (三) 社会经济分层维度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获得度,而非职业声望

为更直观比较 4 个群组在各维度代表性指标上的相对表现,本文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并放大到[0,100]区间内,通过雷达图可以看出 4 个组群在各维度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发现除资本组在经济收入方面远高于其他组外,各组差异最大的维度是公共服务获得度,而非职业声望(见图 3)。

在公共服务获得度维度的 3 个指标中,各组相对位置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指标中,4 个组依次拉开距离,也印证了前述流动人口社会分层模型中公共服务获得度相对重要性最高的结论。相反,各组在职业声望指标上的相对位置较为集聚,说明职业声望并不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分层的敏感指标。

如前所述,以往大部分相关文献都将职业类型或职业声望作为唯一或最主要的社会分层指标,但本文的分层结果表明各组在职业声望上差别不大,而主要差别在公共服务维度。这一结论符合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服务获得度明显区别于户籍人口的客观实际,也揭示了公共服务获得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 (四) 城一城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更优,但尚未形成“橄榄”形

本文依据户籍性质和现居住地类型选取“城一城流动人口”样本,仍使用上述生成的每个样本的社会分层得分,使城一城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可比性。

如图 4 所示,城一城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位置比全国总体流动人口明显更加向上,说明城一城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明显优于总体流动人口。从形状上看,城一城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重心在中部,但中上部仍发育不充分,收缩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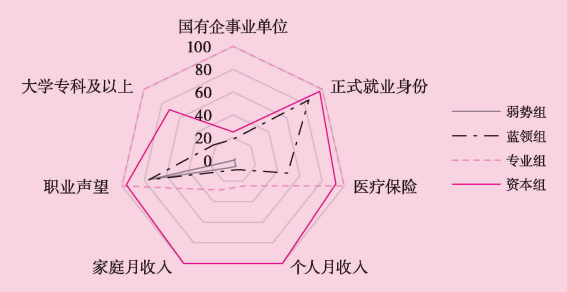


图 3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分组各维度指标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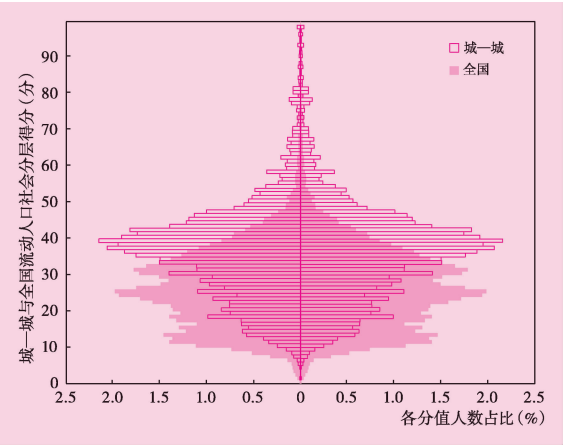


图 4 2018 年城一城流动人口与全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比较

注:同图 1。



快;中下部收缩较为均匀,呈“倒三角”形;最底部的“根”非常小,说明处于弱势状态的人口较少。总体看,城一城流动人口展现出整体性结构优势,中部和中上部比例更高。

以上述社会分层指数分组区间为标准,可将城一城流动人口分为同样的4组。虽然蓝领组占比仍最高,但其内部结构与总体差异较大,城一城流动人口以层级更高的技工组为主,占41.9%,劳工组占29.6%。在其他各组分布上也均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专业组与资本组的占比明显更高,分别为21.7%和1.5%;在最底部的弱势组中同样表现出显著差异,仅占5.2%。这表明,虽然城一城流动人口结构更优,但尚未形成“橄榄”形结构;群体内部仍可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清晰分组,需要差异化推进“本地化”工作。

五、对分层原因的进一步探讨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流动人口总体结构重心在中下部,其中,城一城流动人口重心大致在中部,分层结构明显更优。本文进一步对分层结构差异的内在原因进行分析。

(一) 受教育程度决定流动人口分层重心

2018年城一城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5年,高于流动人口总体平均水平(10.3年),本文认为这是导致其分层重心明显高于总体的根本原因;这也同样表现在2015与2018年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比较中,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6年,略低于2018年。分受教育程度考察流动人口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变动情况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单调递增(见表5)。受教育程度提高不仅带来收入方面的变化,也显著影响职业结构、单位性质,进而影响就业和社会保障度等。

(二) 受教育程度是“流动人口”与“流动人才”群体结构差异的内在原因

结合2019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调研结果可以发现,人口与人才群体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该调研的主体部分是在街乡开展,范围包括91个社区和31个村,得到2236个有效样本;此外,为服务北京人才战略,调研了52家企业中的非北京户籍员工,这些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律师事务所、国企和金融单位等,得到323个有效样本。

两个群体教育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11.0%和86.7%,据此将这两部分群体分别界定为“流动人口”与“流动人才”。

流动人口与流动人才

表5 2018年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各指标变动情况

指 标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国有企事业单位(%)	3.1	3.3	5.7	17.8
正式就业(%)	55.4	64.2	73.5	89.9
医疗保险(%)	17.2	30.4	46.7	73.1
个人年收入(元)	46104	58714	70947	90038
家庭年收入(元)	84274	95903	114723	148813
专业技术人员(%)	1.8	4.4	10.8	35.1
职业声望(分)	38.1	40.9	44.6	51.8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11.6 年和 16.4 年,受教育年限直接决定分层结构重心的差异(见表 6)。一是以“五险一金”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度。流动人才“五险一金”的覆盖率在 90%左右,而流

表 6 2019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与流动人才社会经济状况对比

指 标	流动人口	流动人才	指 标	流动人口	流动人才
五险一金			就业情况		
医疗保险(%)	38.2	89.6	专业技术人员(%)	10.2	45.5
养老保险(%)	38.8	90.3	商业服务业人员(%)	75.7	11.0
失业保险(%)	35.7	88.7	周工作小时数(时)	53.8	46.2
工伤保险(%)	36.2	89.0	居住居留		
生育保险(%)	34.1	88.7	人均月租金(元)	1431	2521
住房公积金(%)	20.9	88.2	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17.7	24.1
收入支出			与未成年子女同住(%)	52.9	79.2
人均月收入(元)	5877	12764	长期居留意愿(%)	56.4	72.4
家庭月收入(元)	8605	18493	终身居留意愿(%)	14.5	26.3
家庭月支出(元)	5009	11615			

注:根据 2019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调研数据计算。

动人口不足 40%,尤其是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很低,只有 20.9%。二是收入支出。与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才不仅收入高,支出也高,说明这两个群体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上,也表现在生活质量、消费模式等方面。三是职业类型。与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更高,而流动人口在劳动效率较低的传统商业服务业的占比更高;平均周工作小时数明显更高,说明就业环境与就业质量更差。四是居住居住情况。流动人才居住条件明显好于流动人口,人均居住面积更大,租金更高;在有未成年子女者中,流动人才与至少 1 个未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为 79.2%,而流动人口该比例为 52.9%,说明流动人才更倾向于“家庭化流动”;同时,流动人才的长期居留意愿与终身居留意愿也更高。

(三) 提升受教育年限将优化流动人口分层结构

2018 年中国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3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9 年,与全国相比,分层结构明显上移,更接近“橄榄”形(见图 5)。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1.6 年,明显提升了流动人口分层重心,优化了分层结构。与全国流动人口相比,资本组、专业组和技工组占比分别上升为 1.1%、18.6%和 28.7%,而劳工组和弱势组的比例分别降至 38.9%和 12.7%。因此,义务教育水平从 9 年提高到 12 年,将对中国形成更为健康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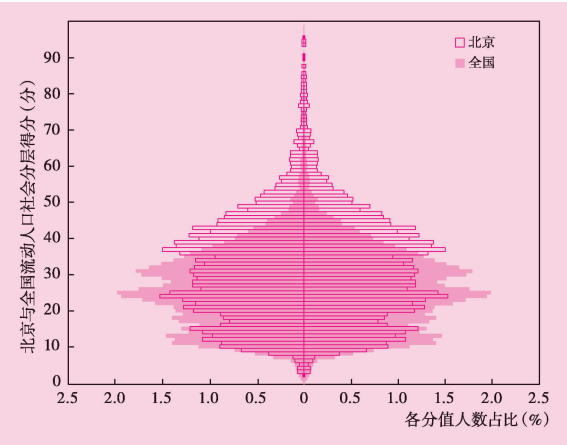


图 5 2018 年北京市与全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比较  
注:同图 1。



人口分层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思考

本文以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为参考,利用2015和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2019年北京市调研数据,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分层结构、特征及变动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分层原因。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中国流动人口社会分层从公共服务获得度、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3个维度进行综合测量,更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其中,公共服务获得度重要性最高,是改善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重点。(2)流动人口分层呈现两端收缩、重心偏下的结构,中下层的人数最多,最底层呈根状收缩,中层及以上发育不足,需针对性引导其演进提升。(3)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结构有所上移,但仍不充分,大部分流动人口仍处在中低部。(4)城—城流动人口的分层结构更优,但尚未达成“橄榄”形,有“本地化”需求。同时,群内分组差异明显,在推进“本地化”工作中需要“分层推进,分类指导”。(5)受教育程度是造成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分层的根本原因,提升受教育水平是未来形成健康稳定分层结构的基础。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根据流动人口分组特征,应率先推进具有资本和技术储备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在当前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结构中,资本组雇主比例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专业组受教育程度最高、就业稳定。从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政策上应率先推进这两个群体的市民化工作,积极扩大就业、稳定城市人才队伍。(2)完善社会培训体系,引导社会培训资源向流动人口素质提升与技能培训分流,推动流动人口结构重心上移。目前,流动人口中77%为蓝领,是一线生产的主力军,他们当中高素质人才较少,以低技能劳工组为主体。建立针对蓝领群体的社会培训体系,由企业主导的技能培训向社会主导、素质与技能并重拓展,强调公益性。提升蓝领群体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推动蓝领组向上流动,促进“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3)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将义务教育分阶段从9年提高到12年,优化未来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义务教育水平,高三以后再进行技校与大学的分流,将形成更为优化的人力资本结构。(4)强化兜底保障,提升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获得度。在本研究的分层结构中,弱势组处于最底端,是社会保障度最低的群体,社会经济状况最为脆弱,抗风险能力低。应重点关注这一群体的兜底保障,全面提升这部分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率。(5)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公共服务对户籍的依附,积极探索城—城流动人口“本地化”路径。城—城流动人口因其城市户籍往往在市民化工作中被忽视,但他们与乡—城流动人口一样,未能享受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有“本地化”需求。探索“本地化”路径,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公共服务获得权益与户籍剥离,打造公平的就业、居留环境,真正推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和城乡一体化。

## 参考文献:

1. 杜旻(2013):《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及地区差异》,《西北人口》,第3期。
2. 顾东东等(201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 何晓斌、董寅茜(2021):《工作权威、工作自主性与主观阶层认同形成——基于创业者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4. 贺雪峰(2017):《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吗》,《学术界》,第3期。
5. 黄江泉(2011):《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6. 李怀(2020):《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新趋势》,《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
7. 李路路等(2012):《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8. 李培林(2011):《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黑龙江社会科学》,第1期。
9. 李培林(2021):《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5期。
10. 李强(2005):《“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第2期。
11. 李强(2015):《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北京日报》5月25日。
12. 刘欣(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13.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学习与实践》,第3期。
14. 齐红倩、席旭文(2016):《分类市民化: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的关键》,《经济学家》,第6期。
15. 秦广强、张美玲(2019):《“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社会》,第2期。
16. 谭日辉、王涛(2019):《留下、离开还是等待——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群体分异及其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7. 谢建社(2006):《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期。
18. 张文宏(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浙江学刊》,第6期。
19. Andersen R.(2011), *Social Strat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Blau P.M., Duncan O.D.(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John Wiley & Sons Inc..
21. Ganzeboom H.B.G., De Graaf P.M., Treiman D.J.(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1):1-56.
22. Marginson S.(2016), The Worldwide Trend to High Participation Higher Education: Dynamic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clusive Systems. *Higher Education*. 72: 413-434.
23. Parkin F.(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Praeger Publishers.
24. Posselt J.R., Grodsky E.(2017), Graduate Educ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3: 353-378.
25. Treiman D.J.(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ademic Press.

(责任编辑:李玉柱)